

裴度（765—839年），字中立，河东闻喜（今属山西）人。历任校书郎、监察御史、中书舍人、御史中丞、刑部侍郎等职，唐宪宗、穆宗、敬宗、文宗四朝宰相。裴度辅佐唐宪宗强力削藩，实现“元和中兴”，在穆宗、敬宗、文宗朝数度出藩，数度入相，“用之则治，舍之则乱”，史称其“出入中外，以身系国之安危、时之轻重者二十年”。

（一）

裴度于唐德宗贞元五年（789年）进士及第，其时，唐王朝正处在多事之秋。自安史之乱后，唐朝国运江河日下，朝廷被愈演愈烈的藩镇之祸折腾得头疼不已。藩镇林立，桀骜不驯，气焰嚣张，且各藩镇相互勾结，遥相呼应，抗拒凌辱朝廷，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。

贞元二十一年（805年）八月，唐顺宗李诵传位于皇太子李纯，是为宪宗。此时的宪宗刚刚27岁，正是胆壮气盛的热血年华，必欲重整山河，力推大唐中兴。在如何对待日益崛起的藩镇问题上，朝中形成了主战派与主和派两大阵营。以宰相武元衡、裴度等为首的主战派，主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，坚定不移地对藩镇实施武力镇压。藩镇酋豪对武元衡、裴度等恨之入骨，先是重金行贿收买，不能达到目的，继而威胁恐吓，企图压武元衡、裴度等就范。

元和九年（814年），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，其子吴元济匿不发丧，伪造吴少阳奏表，请以吴元济为代理淮西节度使，遭到朝廷拒绝。吴元济遂公开举兵反叛。吴元济之所以敢于公开举旗造反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有其他藩镇的怂恿与支持，特别是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、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，暗中为吴元济撑腰打气，并暗中派出刺客前往刺杀主战派骨干大臣。

元和十年（815年）六月三日凌晨，天色微明，黎明前的黑暗依旧笼罩着大地。宰相武元衡在卫队的簇拥下依例赴大明宫上朝，刚刚走出府邸静安坊东门，便遭遇刺客袭击。刺客预先埋伏于黑暗处，待武元衡一行走近，骤然间冷箭齐发，蜂拥而上。另一路刺客前往通化里裴度府邸，埋伏于裴度上朝必经之路的阴暗处，待机而动。“度出通化里，盗三以剑击度，



以身系国之安危

——唐朝裴度平藩的故事

□ 刘立祥

初断鞬带，次中背，才绝单衣，后微伤其首，度堕马。会度戴毡帽，故创不至深。贼又挥刀迫度，度从人王义乃持贼连呼甚急，贼反刃断义手，乃得去。度已堕沟中，贼谓度已死，乃舍去。”

由于裴度头戴一顶扬州毡帽，致命的第三剑才没能造成严重后果，只是受了轻伤。说来蹊跷，裴度头戴的毡帽，是在案发前几天，他的老友淮南节度使李鄴刚刚从扬州寄来的，这顶毡帽别致美观，里面的毡料相当地道结实，裴度非常喜欢，出门必戴，没承想竟侥幸从毡帽底下捡回一条性命。此后，扬州毡帽在京都长安红极一时，成了时髦一族的标配。

（二）

宰相武元衡喋血街头，死于刺客之手；另一位主战派核心人物裴度遭遇谋刺，死里逃生，整个长安城一下子陷入惊恐慌乱之中。一些主和派大臣趁机纷纷上表，请求立即罢免裴度等主战派大臣的官职，以安抚藩镇，以免再生事端。

宪宗览表大怒：“度得全，天也！若罢之，是贼计通行。吾倚度，足破三贼矣！”宪宗不但没有责难裴度，反而对其厚加抚慰，赞赏有加，并派出军队加强对裴度府邸的警戒，以防不测。

三天之后，宪宗降诏，任命裴度为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（宰相）。裴度也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，志在平乱，壮心不已，“以平贼为己任”。宪宗将讨伐藩镇诸军事全权赋予

裴度，“时群盗千纪，变起都城，朝野恐骇。及度命相制下，人情始安，以为必能殄寇。自是诛贼之计，日闻献替，用军愈急”。

讨伐淮西叛藩吴元济之役一波三折。从元和九年（814年）至元和十二年（817年）的四年间，唐军的平叛之战虽偶有小胜，但总体而论收效甚微，用兵旷日持久，朝廷粮饷难以为继，诸将观望厌战，宪宗也深以为忧。主和派大臣请求“罢兵赦罪”的喧嚣数度甚嚣尘上，宰相李逢吉、王涯等人屡以劳损军力、耗费财赋为由，力劝宪宗罢兵。

裴度缄默不语。宪宗征询裴度的意见，裴度一脸肃然，回答掷地有声：臣请求亲自督战。第二天，宪宗在延英殿举行朝会，再议淮西战事，待群臣散去，宪宗单独留下裴度，问道：“‘卿必能为朕行乎？’度俯伏流涕曰：‘臣誓不与此贼偕全。’”宪宗闻而动容，也不由潸然泪下。

于是，宪宗诏命裴度以门下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蔡州刺史，任彰义军节度使及申、光、蔡州观察使，兼任淮西宣慰处置使。同时，应裴度奏请，委任刑部侍郎马总为宣慰副使，太子右庶子韩愈为行军司马，司勋员外郎李正封、都官员外郎冯宿、礼部员外郎李宗闵等任判官及书记等职，即日开赴平叛前线。

元和十二年（817年）八月三日，裴度奉命领兵开赴淮西。吴元济闻兽犹斗，拒绝投降。十月十一日，随唐邓三州节度使、西路唐军统帅李愬出奇兵突袭，雪夜攻破悬瓠城，生擒吴

元济。次日，裴度入城，宣谕朝廷恩威，抚慰百姓，济弱扶倾，依罪行轻重对吴元济旧将施以刑罚，废除吴元济时严刑峻法，迅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，蔡州父老无不感激涕零。

至此，震惊全国持续30余年的淮西叛乱宣告被平灭。淮西的平定，清除了唐王朝的一个心腹之患，也使其其他割据藩镇闻风丧胆。

（三）

唐宪宗李纯在裴度辅佐下，一鼓作气，平定淮西，收复成德，再平淄青，结束了自唐代宗广德年间以来藩镇跋扈、凌辱朝廷的混乱局面。宪宗自以为功盖盖世，日渐骄奢淫逸，罢斥贤良，任用奸佞，宠幸宦竖，信仙好佛，遍求长生不老之药。裴度渐渐被疏远，他依旧“执性不回，忠于事上，时政或有所阙，靡不极言之，故为奸臣皇甫镈所构，宪宗不悦”。

元和十四年（819年），裴度被排挤出京师，以检校左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出任河东节度使。元和十五年（820年）正月，宪宗暴死，太子李恒登基，是为唐穆宗。25岁继位的唐穆宗，浑身没有丝毫乃父曾经志在四海英武雄豪的气概，却在骄奢淫逸、昏庸无道、痴迷金石之药、追求长生不老等胡来和荒唐方面，比起乃父则有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如此一来，宪宗时期好不容易得来的大好形势随之急转直下，藩镇纷纷重又举起了叛旗，天下复归大乱。

国难思忠良。穆宗紧急诏令裴度

以原职任镇州四面行营招讨使，开赴平叛前线，后又晋升裴度为检校司空、兼任掌管北山诸番使。裴度挥师纵横天下，屡建功勋，屡屡挽狂澜于既倒。在此后的敬宗李湛朝、文宗李昂朝，裴度屡屡遭受一拨又一拨奸佞和宦竖的构陷谗害，在仕途上跌跌撞撞。每当国有危难，朝廷便起用裴度前往“灭火”，当危机解除，又遭谗害排挤，如此循环往复，随着国运兴衰，几度入相，几度出藩。

天下一有风吹草动，朝廷正直大臣必纷纷上疏请求立即起用裴度，裴度也总是不负众望，“用之则治，舍之则乱”，以身系国之安危二十年。裴度声誉之隆盛不仅笼罩朝野，甚至远播外域，“时有奉使绝域者，四夷君长必问度之年龄几何，状貌孰似，天子用否？其威名播于憬俗，为华夷畏服也如此”。

（四）

裴度晚年，眼见政事不可为，又体弱多病，渐渐追随世俗以避免身遭祸事。他在东都洛阳集贤里建造宅第，每日与白居易、刘禹锡等好友吟诗唱和，把酒相欢。他曾在自己的一幅画像旁手书《自题写真赞》：“尔才不长，尔貌不扬。胡为将，胡为相。一点灵台，丹青莫状。”细细品味，字里行间，有几分自矜，也许还有几分自嘲。

开成四年（839年）上巳节（三月三），文宗在曲江池赏赐宴饮，群臣纷纷赋诗唱和，裴度因病不能赴宴。见

不到裴度，文宗若有所失，挥笔赋《上巳日赐裴度》诗：“注想待元老，识君恨不早。我家柱石衰，忧来学丘祷。”——注望想念您啊，我的元老重臣，可惜认识您太晚了。您是国家的栋梁柱石，不能失去您呀，我忧心忡忡像孔子那样为您祈祷。

诗成，文宗仍觉意犹未尽，遂又提笔在手，亲书御札：“朕诗集中欲得见卿唱和诗，故令此。卿疾恙未痊，固无心力，但早日进来。春时俗说难于将摄，勉加示调护，速就和平。千百胸怀，不具一二。药物所须，无俾奏请之烦也。”墨迹未干，急遣使者前往送达。

文宗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当他挥毫赋诗抒发殷殷深情之时，他倚为“柱石”的元老重臣裴度已命悬一线。送信使者刚刚踏进裴度府邸大门，病榻上的裴度遽然驾鹤西去，终年75岁。噩耗传来，文宗悲痛不已，命人将那封信放于裴度的灵位之上，降诏赠裴度为太傅，谥号文忠，辍朝四日，命京兆尹郑复监护料理丧事，办理丧事一应所需，全部由官府供给。

唐朝自安史之乱以后，藩镇拥兵自重，遥相呼应，凌辱对抗朝廷，成为朝廷的心腹之患。裴度志在报国，以天下兴亡为己任，誓与叛镇不共戴天。即使面对武元衡喋血街头死于叛镇之手的前车之鉴，自己也遭遇叛镇派出的刺客谋杀，险些丢了性命，依然毫不动摇，不惧生死。辅佐唐宪宗李纯强力削藩，主动请缨，亲冒矢石，督战淮西，纵横天下，平定了持续30余年之久的藩镇之乱，清除了唐王朝的一个心腹之患。在穆宗、敬宗、文宗朝，屡遭奸佞与宦竖的轮番构陷打击，起起落落，随着国运兴衰，几度入相，几度出藩，忍辱负重，屡建功勋。

李商隐赋诗《韩碑》赞之曰：“帝得圣相相曰度，贼听不死神扶持。腰悬相印作都统，阴风惨澹天王旗。愬武古通作牙爪，仪曹外郎载笔随。行军司马智且勇，十四万众犹虎貔。入蔡缚贼献太庙，功无与让恩不訾。帝曰汝度功第一，汝从事愈宜为辞。”



为政之要，惟在得人

《诗经》中的为君之道（三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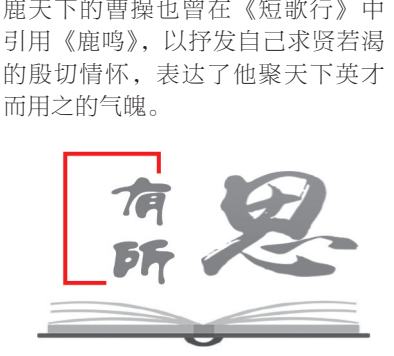
□ 郭代杰

曾说道：“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，……《诗》曰：‘无将大车，维尘冥冥’言无与小人处也。”

当然，能臣在位对于君主的治国理政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如武王灭商后去世，成王年幼，周公辅政，他排内忧、解外患，为成王执政扫除了障碍。《论语·颜渊篇》说：“舜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皋陶，不仁者远矣。汤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伊尹，不仁者远矣。”舜、汤有了皋陶、伊尹，不仅坏人难以存在，且会实现“举直措诸枉，则民服”的效果。

第二，礼贤下士。子曰：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”贤者是国家前进的推动力，国君只有乐于招纳贤士并尊重之，贤能之士才会竭尽全力地为国家效力，“贤良之士众，则国家之治厚；贤良之士寡，则国家之治薄”。在《周南·卷耳》中，就以“崔嵬”“马病”等事描绘了人君为求得贤才，长途跋涉，不辞辛劳，躬亲访求的情景。《毛诗序》云：“又当辅佐君子，求贤审官，知臣下之勤劳。内有进贤之志，而无险谗谄谀之心，朝夕思念，至于忧勤也。”

《小雅》首篇《鹿鸣》也描绘了一番国君以盛宴款待嘉宾、其乐融融的景象，希望有志之士能心悦诚服地为国效力。《毛诗序》云：“燕群臣嘉宾也，既饮食之，又实币帛筐篚，以将其厚意，然后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矣。”《孔子诗论》评价这首诗为：“《鹿鸣》以乐始而会，以道交，见善而效，终乎不厌人。”以《鹿鸣》为乐添酒开宴，君臣以道义相交，“见贤思齐”，乐而忘返。逐鹿天下的曹操也在《短歌行》中引用《鹿鸣》，以抒发自己求贤若渴的殷切情怀，表达了他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气魄。



张謇与中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的创办

□ 邓田田

濠河苑圃都瑋彬，风物骈骈与岁新。证史匪今三代古，尊华是主五洲宾。能容草木差池味，亦注虫鱼磊落人。但得诸生勤讨论，征收莫惜老夫频。

——南通博物院创办人张謇《营博物院》

1905年，近代著名实业家、教育家张謇，以振兴科教和普及文化为目的，在江苏省南通市的濠河之滨创办了中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——南通博物院，中国的博物馆事业由此在南通发祥。

张謇，字季直，江苏南通人，清末状元，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、教育家、政治家。张謇毕生把实业和教育视作振兴国家的两大根本，从1896年起，他陆续创办了大生纱厂、大达轮船公司、淮海实业银行等20多家企业，创立了师范学校、农科大学、纺织学校、医科大学、盲哑学校、伶工学校等370多所学校，并兴办了更俗剧场、博物苑、图书馆、养老院、育婴堂、女工传习所等社会事业，为中国近代工业、科技、文化、教育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。南通博物院，全部由张謇个人自筹资金创建，正是他实现自己“新新社会雏形”理念的产物。

博物馆是一种进步的文化形式，承载着大众教育和终身教育的任务，

“博物”一词最早见于《左传》，“晋侯闻子产之言曰：‘博物君子也’”，“博物”意为博学多识；“苑”者，园囿也。南通博物苑园馆一体，融合了中国苑囿之美与西方博物馆理念，以“设为庠序学校以教，多识鸟兽草木之名”为创建宗旨，鸣响了近代文明的汽笛。

1903年，张謇赴日本考察了70多天，其间参观了东京帝国博物馆等文化机构。他发现，日本的很多职业技术学校或高等院校，都设有自己的博物馆或植物园，这使他深有感触。他上书清政府，指出教育关乎国运，而博物馆正是普及大众教育、进行终身教育的机构，是学校教育的有力补充和坚强后盾，建议在京城设立帝室博览馆并由此在全国兴建博览馆。数次上书，都得不到重视。

张謇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在于当时民智未开，要振兴国家，就必须开“开民智，明公理”。为此，他身体力行，1905年，他以大生集团的赢利为后盾，在他所出资创办的南通师范学校之西，修建了集科学、历史、文化、艺术于一体的南通博物院。

南通博物苑的创立有着浓厚的维新思想色彩，即教育兴国。因此，与传统的私人文物藏馆不同，南通博物苑科学与人文并重，陈列大量天产

（自然科学）、历史、美术、教育展品。中馆始称“测候所”，是一个小小的气象站，屋顶原是观测平台，摆放着测候仪器，每日预报天气，并在报纸上登载天气预报。南馆又称“博物楼”，是主要陈列室，楼上陈列历史文物，楼下陈列各种动、植、矿物标本。南馆建有古像亭，陈列各种石刻与雕像。南馆阳台上悬挂着张謇亲书的对联：“设为庠序学校以教，多识鸟兽草木之名”。表明博物院是一所社会学校，起着启迪民智的作用。北馆陈列着当时非常罕见的长颈鲸骨架，长达12米。博物苑里广种各种花草植物，并饲养了少量动物，既是一个博物馆，又兼有植物园、动物园的特点，花木繁茂，绿树葱葱，小亭精巧，水榭玲珑，融古典园林与近代文明于一体。小小一方天地，散发着科学与文化的芬芳，吸引着无数好学之士源源不断地前来求知。梁启超、陶行知、黄炎培、竺可桢、梅兰芳等著名学者、科学家、艺术家都曾汇聚于此。

博物馆的创办离不开丰富的展品。为了开办南通博物院，张謇不仅率先把自己收藏和购买的大量文物、标本和鸟兽草木全部捐给博物院，并且利用自己的声望，通过各种渠道，发布启事，广泛征集海内外藏品。1910年，南洋劝业会在南

京举办，张謇大量出资购置展品，大大丰富了博物苑的展库。在各方面的努力下，经过多年经营，博物苑的藏品已具备相当大的规模。1914年编印的《南通博物苑品目》共收录天产、历史、美术、教育四部藏品2973号，1933年增至3605号，每号各有一至若干件藏品，可见种类之繁，内容之多。

为了创办南通博物苑，张謇几乎倾注了他后半生的全部心力，对博物苑的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无不亲力亲为，殚精竭虑。为了博物苑的建设，他亲自拟定管理章程、观览简章，发布征集启事，组织专家对藏品进行科学研究，并对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理论上的阐述。对于藏品的展览，他认为不能简单地划分归类。他指出，从天演之进化过程看，自然之中有历史；从人世之变更历程看，美术之中也有历史。他以发展的、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展品中所蕴含的意义，即折射出自然的、社会的运动规律，从而指导人们更科学地认识世界，观古今之变化，识文明之发展。在规划与创办南通博物苑的过程中，张謇先后写下《上海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室博览馆议》《上学部请设博览馆议》《博物院观览简章》等文，为中国自己的博物馆学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。